



冲突与协调 ——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Focused on the Wars and Conference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邓曦泽 著

冲突与协调

——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 Focused on the Wars and Conference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邓曦泽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 逸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邓曦泽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4951-6

I. ①冲… II. ①邓…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时代 IV.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002 号

冲突与协调

CHONGTU YU XIETIAO

——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

邓曦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9

字数:676 千字

ISBN 978-7-01-014951-6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历史早已终结

一、《春秋》读罢不见史

《春秋》读罢不见史，历史早已终结。

当年，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于20世纪90年代，终结于资本主义民主这种形态，但福山错了，因为历史早已终结了。后来，福山对其历史终结结论似有悔悟，但福山又错了，因为历史的确终结了。

历史终结于何时？——终结于春秋时代。换言之，历史终结于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也许是巧合，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可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①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辉煌灿烂，都出现了伟大的文化巨人——中国有孔子、老子及诸子百家，古印度有《奥义书》和佛陀，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巨人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各自所在的文明圈，成为这些文明圈的思想之源，并使这些文明圈呈现出迥乎不同却又可以交流沟通的文明之花。

说历史终结于春秋时代，并非因为本书是书写春秋时代的，因而要刻意夸大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其实，雅斯贝尔斯已经表达了历史终结论的意思。他指出，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的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②而这一特征完全可以理解为历史的终结。只不过，雅斯贝尔斯没有明确意识到他道出了历史早已终结，因而没有明确、清楚地阐述历史终结论。

不仅轴心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思考的基本范围，并且轴心时代的任何一个轴心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都产生甚至规定了我们今天思考的基本范围。所以，说历史终结于春秋时代、古希腊时代、古印度时代或笼统的轴心时代，其实都是等值的。

①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②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二、为什么说历史终结于春秋时代

历史终结于何时？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凭什么说历史终结了？又为什么说历史终结于春秋时代/轴心时代？

历史风云激荡，那些人、事和物，戴着日新月异、五彩斑斓的面具不断变幻着。历史毫无疑问在继续。倘若谁把历史终结论理解为时间意义的历史停止论，他显然是愚蠢的。如果能够大体明白人类的活动方式，并且可以确认，这些活动方式都呈现出来了，就可以说，历史终结了。这种终结，是形态而非事件及其过程的终结。那么，历史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历史以“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结构呈现出来，而该结构也就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

在历史上，中国的《春秋左传》和西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两部伟大史书都分别完整、充分地展现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产生了人类思考的基本范畴。与理论著作不同，这两部史书是以事件而不是以概念、辨析和论证的方式展现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而正因为史书记录的是最生动、直接的事件，所以它蕴涵的信息异常丰富。在问题层面，《左传》反映了人类面对的一切基本问题，例如，如何增加社会财富？如何实现公正？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协调社会冲突？如何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即如何治国平天下）？如何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如何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即如何实现大同）？如何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为何呈现为人们所见的样态？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如何面对死亡？等等。迄今为止，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在《左传》中，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现象，正义与邪恶、冲突与协调、高尚与卑鄙、贫穷与富裕、压迫与反抗……无一不交织纷错。例如，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大国欺负小国的霸权主义并不让人陌生，美国就在搞单边霸权。其实，霸权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也经常发生。在方法层面，《左传》也反映了人类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如协商、谈判、合作、镇压、战争、干涉、蛮横、紧逼、让步、妥协、阴谋、阳谋、推理、论证，等等。在《左传》中，既能看到彬彬有礼的谦让，也能看到蛮不讲理的暴行；既能看到一言九鼎，也能看到背信弃义；既能看到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也能看到泯灭天良、苟且偷生……我们在今天能看到的，在《左传》中都能找到同类事件。

三、除了武器,一切都没有改变

《左传》读毕,关于人类的生存问题,尤其是此伏彼起的人类冲突,不但不能让人释疑,反而更让人疑惑: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上没有新鲜事。读来读去,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古往今来的事,看似纷繁复杂,其实都是穿着不同的戏装演绎同样的故事。

要说变化,古今沧海桑田,变化不可谓不大。尤其是,从技术手段看,古今变化的确很大。古代是用神话奔月(嫦娥奔月),现代是用宇宙飞船奔月;古代是用神话来拓展人类的视域(千里眼、顺风耳),现代则是用人造卫星、无线通讯来拓展视域。但是,就人类面对的问题和处理方式来看,则很难说古今有多大的变化。《左传》所反映的基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正义与邪恶、冲突与协调、高尚与卑鄙、贫穷与富裕、压迫与反抗……同样交织在当今世界。统治者的贪婪、无耻与残暴,在今天仍不断演绎。晋国、楚国的大国欺负小国的行径,在今天的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身上,变本加厉地演绎着。若一定要我说出从古到今的变与不变,我只能说:“除了武器,一切都没有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且不断延伸,但历史书其实只需要一本。

鉴于此,作一词《忆秦娥·史鉴》,以为结,感叹历史的蹒跚与无奈——

忆秦娥·史鉴

弯弓月,
凜光悄跃梨花雪。
梨花雪,
何来春色?
竟如冬掠。

欲追往事知兴灭,
本朝书写前朝血。

前朝血，
诸君休道，
定然销绝。

目 录

自序 历史早已终结	1
本书表格向导	1
导 论 问题、方法与历史:理论背景的反思与建构	1
第一节 历史能否为鉴	1
第二节 历史的生存结构:问题、方法与效用	5
第三节 发现理论还是验证理论:历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17
一、知识生产: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	18
二、历史研究:一种经验归纳的知识生产方式	23
三、从发现理论到验证理论:知识生产视角下历史研究的 范式变迁	31
四、问题研究:历史研究的出路	42
第四节 历史:财富还是包袱	47
一、历史是财富:历史提供行动指示	47
二、历史是包袱:历史价值日益衰减	49
三、“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56
第五节 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生存结构派生的研究类型	60
一、生存结构决定学术的目的、地位与基本类型	62
二、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区分	72
三、问题研究优于文本研究及二者的互补	76
第六节 本书的问题、文本选择与文献综述	79
一、本书的问题及其选择理由	79
二、本书的文本及其选择理由	83
三、文献的有效性问题	84
四、当前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86
五、关于春秋战争与会盟的统计	91
第七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	93

一、研究方法的先行	93
二、多学科方法	95
三、几何学式证明方法	97
四、比较优势研究法	98
五、方法论的超越意义:科学化方法与中华文明的再造	101
六、本书的学科归属	110
第一章 春秋政治的基本格局	112
第一节 周朝:独特的体系国家	112
第二节 尊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120
第三节 攘夷:国家安全的维护问题	126
第四节 争霸:体系主导权的争夺	128
一、争霸是春秋政治的主线	128
二、体系政治的核心问题必然是争霸	136
三、春秋争霸对尊王与攘夷的利用	141
四、尊王、攘夷在争霸中的战略意义	153
第二章 春秋政治提出的和平问题	156
第一节 由春秋争霸引出的和平条件及计算问题	156
第二节 和平的条件:规则+执行	158
第三节 和平的计算:和平函数的建立	166
第四节 和平函数的应用限制、价值及比较优势	169
第五节 春秋争霸的必然性:和平函数的宏观运用	182
第三章 春秋战争与天下秩序	185
第一节 春秋的争霸与战争	185
第二节 春秋争霸的格局与走势	190
一、郑庄小霸:挑战周王,拉开争霸序幕	190
二、齐桓称霸:明尊王实弱王	200
三、晋文称霸:以力假仁	209
四、晋楚拉锯:全面争霸	216
第三节 争霸实力的来源:对内治理决定对外竞争	248
第四节 战争改变秩序	263

第四章 战争与会盟:冲突与协调的交织	269
第一节 春秋战争观:战争是不可持续的恶性手段	269
第二节 会盟与战争的关联:宏观数据	288
第三节 会盟与战争的关联:微观案例	290
第五章 春秋会盟的协调机制	295
第一节 诸侯的协作:诸侯参与会盟时间成本考察	295
第二节 春秋会盟的三大协调机制	303
一、激励机制	303
二、惩罚机制	316
三、历史评判机制	321
第三节 春秋会盟的历史渊源与惯性力量	330
一、封建与会盟的关系	330
二、封建与会盟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338
三、会盟的惯性力量	343
第六章 春秋会盟的功能和效果	350
第一节 诸侯的谈判与妥协	350
第二节 会盟对战争的遏制	363
第三节 会盟对协作的促进	376
一、会盟促进民生的改善	376
二、会盟促进诸侯国的联系、团结与友谊	379
三、会盟对王室利益和天下秩序的维护	381
第七章 冲突与协调中的大国和平问题	383
第一节 和平崛起如何可能	384
一、和平崛起问题	384
二、齐国称霸:和平崛起的范例	389
三、和平崛起的条件分析	395
四、探索和平崛起之道路	402
第二节 反对霸权如何可能	406
一、对霸权主义的基本理解	406
二、国际无政府:霸权主义的发生条件	409
三、追逐霸权: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选择	412

四、反对霸权主义的可能性与基本路径	414
第八章 世界和平与世界政府	417
第一节 世界和平呼唤世界政府	417
第二节 和平与政府性的关系	425
一、和平的实现条件:规则+执行	425
二、在和平问题上个体交往与国家交往的同构性	426
第三节 交往、合作与政府性的关系	427
一、交往的经济学根据	427
二、交往成本降低和生产合作条件:规则+执行	428
三、在交往、合作问题上个体交往与国家交往的同构性	429
第四节 世界政府的应然性与可能性	430
一、政府性的合目的性	430
二、世界政府一直在形成之中	432
三、世界政府得以形成的技术推动	435
四、世界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博弈与曲折	437
五、世界政府的可能模式	439
结 语 春秋政治与人类未来	442
第一节 历史在重演:冲突与协调中的春秋政治结构	442
第二节 除了武器,一切都没有改变	443
第三节 天下太平:梦想还是理想?	450
附录 1 春秋左传战争考	453
附录 2 春秋左传战争表	473
附录 3 春秋左传会盟表	534
参考文献	574
索 引	588
本书部分内容单独发表情况	596
后 记 这是一根鸡肋	598

本书表格向导

说明:本书共有表格 24 个,除了表 1、2、5—8,其余 18 个皆跟春秋战争与会盟直接相关。其中,附录 2、3 是一级统计,表 3、4、9—22 是二级统计。这 18 个表是对本书结构、线索的一种宏观呈现,尤其是对春秋战争与会盟的交织与演进之宏观呈现。为让读者鸟瞰本书的结构与线索,且为便于检阅,特将所有表格之目录置于书首。

表 1 汉武帝对以史为鉴的结构之反思	11
表 2 比较优势(相对进步)的模型	100
表 3 春秋争霸历程表	132
表 4 中原诸侯配合楚国征战表	149
表 5 和平函数的比较优势(情况 1)	181
表 6 和平函数的比较优势(情况 2)	181
表 7 和平函数的比较优势(情况 3)	182
表 8 和平函数的比较优势(综合)	182
表 9 春秋争霸与战争关联表	186
表 10 春秋霸主战争胜负对比简表	188
表 11 郑庄公参与战争表(公元前 722—前 701 年)	191
表 12 齐桓公参与战争表(公元前 685—前 643 年)	201
表 13 晋文公参与战争表(公元前 636—前 628 年)	210
表 14 晋文公后晋楚交战表	217
表 15 晋文公后宋国战争立场归类表	219
表 16 晋文公后郑国战争立场归类表	226
表 17 晋文公后晋楚拉锯情况总表	234
表 18 春秋左传代理战争表	237
表 19 春秋会盟与战争关联总表	289
表 20 诸侯参加会盟单程耗时抽样统计表	297
表 21 晋楚拉锯期间晋楚争郑表(公元前 627—前 546 年)	309
表 22 春秋时期战争频率与会盟频率关联表	335
附录 2 春秋左传战争表	473
附录 3 春秋左传会盟表	534

导论 问题、方法与历史:理论背景的反思与建构

如果说历史是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重要源泉,那么,作为雅斯贝尔斯所言的中国轴心,春秋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源头活水。关于春秋历史与政治,《左传》的记载最为翔实。而在《左传》中,记载最多的政治事件是战争与会盟,二者纷纭交错。战争是剧烈冲突,会盟主要是协调。值得探讨的是:春秋战争与会盟中的冲突与协调蕴涵了什么政治意蕴?具有哪些结构性特征?又可以给出什么启示?本书试图以冲突与协调为纲,以战争与会盟为目,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节 历史能否为鉴^①

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诉求。但是,以史为鉴是合理的吗?它又如何可能?

下面,暂且搁置本书的主要问题,先反思历史本身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有何价值,从而明确本书的理论背景。^②

① 导论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主要内容已独立成文并发表(参见邓曦泽:《以史为鉴如何可能——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另外,本书导论有一特点,就是贯穿着知识生产的视角。导论第一、二节即已从知识生产视角展开讨论了,而从第三节开始,这个视角就完全明确了。第三节开头论证了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并以其为基础展开此后的讨论。笔者以导论为基础,基于知识生产视角,形成了几篇独立论文:《以史为鉴如何可能——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以第一、二节为基础)、《发现理论还是验证理论——现代科学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困境及出路》(以第三节为基础)、《历史:财富还是包袱——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以第四节为基础)、《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基于知识生产视角的学术方法论探讨》(以第五节为基础);《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以第七节之五及第三节之部分内容为基准)。这几篇论文均已发表。另外,还有《加强大学教育基本能力训练》(《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第9期)、《人类文明的终结——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等。基于知识生产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学术与某些社会现象,可以产生不少新见。

② 本书导论第一节至第四节都是讨论理论背景。并非每篇论文或每本书都需要专门讨论理论背景。对于多数论文或著作,理论背景都是自然预设的,即都是在某个众所周知的理论背景下讨论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修改了理论背景或对现有常规理论背景持怀疑态度的论文或著作,就有必要专门考察理论背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背景是:在目的上,要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很早就建立了史官制度。在孔子之前,史书的撰写都是官方垄断的,而孔子作《春秋》,开启了私家修史的先河。秦汉以后,史学^①极为发达,官修史书与私修史书互为补益,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浩繁的史书体系。

古人为何如此重史?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著史乃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②究际通变又是何为?一言蔽之,乃是为了知今知来,规避错误,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旨归。此种历史观,也就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③“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④“以古为鉴,可知兴替”^⑤等等所传达的理念。

以史为鉴并非中国人的独特诉求,只不过,也许中国人更看重历史而已。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编年史,其中哀乐相同,兴衰交替?”^⑥此言意味着历史的职能是记录和总结兴衰交替(的规律)。亨佩尔(Carl G. Hempel)明确指出历史研究要假定和总结普遍规律。^⑦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指出,“在历史中,事实已经给出,要找寻的是原则”。^⑧此言大体说出了,历史学是要对大量历史事件进行归纳,寻找规律。麦考莱之所言,也就是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布洛赫(Marc Bloch)则明确指出以古知今的必要和可能,他说:“对历史的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

以史为鉴;在工具上,历史具有实用价值;在可行性上,历史可以为鉴。这种观念乃是人们(尤其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观念。但是,本书认为,历史具有多大价值,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鉴,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所以,本书从知识生产视角专门讨论了理论背景。本书的理论背景,用问题的方式表达,则是:历史具有什么价值?以结论的方式表达,则是:历史的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认知信息,即行动指示,但是,对于任何一类历史事件,后发事件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递减(即边际价值递减),此即后文将详细讨论的历史价值递减规律。

① 严格说来,史家和历史学家是不同的,相应地,史书和史学著作也是不同的。前者,如司马迁、班固、魏征、欧阳修等记录历史的人及相关著作;后者,如刘知几、袁枢、赵翼、梁玉绳、陈寅恪、蒙文通等研究前人对历史的记录的人及相关著作。

② 《汉书·司马迁传》。

③ 《诗经·大雅·荡》。

④ 《战国策·赵一》。

⑤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十二册卷97“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80页。

⑥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2页。

⑦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59—875页。

⑧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7页。

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①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也指出历史中存在着老方法和新方法的变迁及二者的协调问题。^②

以史为鉴希望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行动指示,这种历史观显然是实用主义历史观。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历史真的能规避错误吗?第二,实用历史观是否合理?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③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使人们规避错误,即便它不能防范新问题产生,但至少也应该解决了不少老问题吧?事实是否如此呢?例如,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④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寓褒贬于事,劝谏世人与后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⑤可是,乱臣贼子真的因读《春秋》而惧吗?——未必。后世臣弑君者,子弑父者,何曾断绝?又如,腐败是中国历史(也不限于中国历史)的一个顽症,不仅历代史家对腐败大加鞭挞,并且官方文件也对腐败深恶痛绝,例如,明末崇祯皇帝在其《责臣罪己》(罪己诏)中就说:“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但实际上,违背初衷的官吏又何其之多,“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羨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在腐败造成的严重剥削下,民不聊生,以至于崇祯都感慨:“嗟此小民,谁能安枕?”^⑥既然古代的官方、民间和学界对腐败都如此深恶痛绝,那么,腐败是否在历朝历代的痛贬声中有所好转呢?似乎没有看到历史鞭挞的明显效果,以至于王亚南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斲史,但从另一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⑦的确,哪个朝代的后期不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继而导致社会动乱,王朝解体?再如,无论

①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② [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5—447页。

③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导论第四节之一的末尾。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尚书·毕命》。

⑥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9页。

⑦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中国史还是人类史上,战争都非常频繁,仅《左传》就记载了 745 次战争。^①同时,人类本来并不希望战争,而是渴望和平。但是,战争为何此伏彼起呢?到了 20 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还发生了不少战争。在世界范围内,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伤不计其数。并且,各国还在不断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总是企图置对方于死地。人类离永久和平,还很遥远。上述案例意味着,通过历史上的是非成败来规避错误,远非人们所预期的那么可靠。

那么,历史对后人究竟是否还有价值?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乃历史学的宗旨。这一宗旨乃是在认知上说的,而不是说人们在行动上已经实际地遵循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殷鉴不远”“以史为鉴”之“鉴”,本意是镜子。镜子最主要的功能是映照人的容颜,因为人无法看到自己的容颜,而只有借助他者(如镜子的映照、他人的描述和评价)。而照镜子的目的又是为了发现自己容颜的优缺点,以便帮助自己修正容颜。但是,一个人即便发现了自己容颜的缺点,也不等于他就会采取行动去改变。发现问题与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是两回事。因此,所谓“以史为鉴”,乃是通过历史上的事件为人们提供一种认知,亦即行动指示,告诉人们某些事情的当下状况与未来变化,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应对。行动指示可以分为经验和教训,经验通常是在积极角度讲,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教训是在消极角度讲,它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不过,人们是否根据指示而行动,则根本不是历史(或历史学)所能为力的。换一种学术的表达则是,以史为鉴只有判定功能,而无执行功能,“一切理论(广义,含一切规则、学科、学术)都只有判定功能而无执行功能。判定功能包括对事件(问题或方法)的特征作出区分,和为行为者提供行动指示。行动指示也要进行区分,告诉行为者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当然,这不是说理论所给出的判定就是有效的,而是说,理论的任务就是提供判定功能。如果一个理论根本没有判定功能或它所提供的判定完全无效,那么,该理论就是无效的理论,也是无价值的理论。执行功能则是一个东西自己能够发出力量,以实现它的目的。只有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个体或群体)才具有执行功能,规则自身并无执行功能。无论在个人行为还是公共交往中,判定功能都是为执行功能提供根据;而在公共交往中,判定功能还有使行为者所提供的根据尽可能被交往各方认可的任务。但是,行为者即便知道了该如何做,也不等于他就会如何做,或就有能力如何做。行为者不遵守规则,不是规则的责任,规则的责任必须不大于其功能。虽然规则没有执行

^① 参见本书附录 2。

功能,但是,其判定功能并不受行为者是否遵守规则的影响。如果某个行为者遵守或违反规则,其他人(以及行为者自己)就可以运用规则对他进行判断,判定其行为是遵守或违反规则的”。^① 如果某个行为者不遵守规则,人们就可以运用规则判定该行为者的某行为是不正义的,于是,人们就有正义的理由强行监督行为者改正,迫使他遵守规则。要使规则得以实现或要使公共交往有效进行,需要满足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建立有效的规则体系,即建立有效的公共交往平台,使行为者行为的价值属性成为可判定的;二是培养、壮大执行力量。^② 判定功能与执行功能的区分,有助于理解理论的价值与限度,而不应把理论视作无边界的東西,从而把理论无能为力的功能强加给理论,进而误导问题的解决。在历史的判定功能中,有一重要的具体功能就是预测,为人们提供行动指示。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过去的事件而知道某些事件的未来变化,从而为人们控制、改变这些事件提供行动指示。当然,这种预测很难做到精确。

正是在以史为鉴的可能性下,本书才试图以冲突与协调为视角,以战争与会盟为材料,考察春秋政治蕴涵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启示。

第二节 历史的生存结构:问题、方法与效用

把以史为鉴限定在判定功能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的判定功能如何可能?它又有多大的可靠性?

历史之所以具有判定功能,是因为它蕴涵了生存结构,是生存结构的展开,但是,不能夸大历史的判定功能,其判定功能的可靠性是有限的。^③ 根据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可以推论出:历史可以为鉴,但可靠性有限。下文详述这一论点。

人类的生存活动由各种各样的事情构成。任何事情都具有“问题+方法+效用”的结构,这一结构的含义是:任何事情都是不断面对各种生存问题,寻找各种方法,以求最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在行动之后考察方法的有效性;如果方法的有效性低,则调整方法,以求更有效地解决问题。“问题+方法+效用”,也可以表述为“目标+方法+效用”。方法是广义的,包括手段、

① 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② 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③ 当然,对于社会事件(这里特指仅靠自然科学方法无法处理的事件),人类至今尚不能作出可靠的判定,尤其是不能作出可靠的预测。通过归纳历史上发生的同类事件,有助于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但可靠性有限。